



甲子心迹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建院/校60周年纪念特刊
广州华侨学生补习学校





华文学院的变迁



创新。



团结进取，高学历高职称的教职工队伍



成立全国首家专业的华文教育研究院



研发《华文教师证书》资格认证方案



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在我院学习和生活



为海外各国开发本地化教材（图为赴柬埔寨开展教材编写调研）



我校与教育部语信司共建的海外华语研究中心



学院拥有博、硕士授权资格，其中海外华语研究与华文教学博士、硕士点为国内首创



在南非建立暨南大学首家孔子学院



在欧美、东南亚等8个国家招收兼读制研究生及华文教育、对外汉语、汉语言本科生（图为英国函授点课堂一角）



60年代瘦狗岭上留影



1955年于补校礼堂前留影



1964年瘦狗岭校门口留影



1956年全体同学于石牌校址校门前留影



高一同学1959年花县华侨农场学农



1957年广州华侨补习学校首届运动会主席台



秋收慰问宣传队



1978年复办第一年理三班班主任张树人老师送陆海英、黄玉瑶同学参军留影



校友关注母校发展



发行量超千万的《中文》教材



中文教材初中版



CSCI扩展版来源期刊(语言学类)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术季刊《华文教学与研究》



由华文学院学生担任策划、采编、美工、出版等工作,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侨刊《广州华苑》

桃李芬芳一甲子

60年花开花落，60载春华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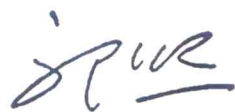
对不少人来说，花甲之年回眸过往，会发现它如同一杯普洱，厚重而醇香。历经60年风雨洗礼的华文学院，拥有这份浓厚的味道；和人所不同的是，它透出了一所老校时刻迸发的无限生机、青春活力以及所赋予我们未来的无尽可能。

闲暇之时，我喜欢在位于瘦狗岭的华苑散步，欣赏品味这个“小联合国”的方方面面。上百个国家和地区莘莘学子在这里生活学习，多元文化在这里和谐共融。学院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用汗水和智慧，去发现中国博大精深的语言文化之美，去享受每一次进步与成功带给我们的无穷乐趣。60年的光辉岁月，留给了我们宝贵的财富——从龙湖、北楼到华侨学生接待站，从五洲学子塑像、办公大楼再到崭新的笃行楼、敬慎楼学生宿舍。语言和文化的交流，历史和现代在这里的交汇，拉近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更凝聚了一代代华文人的精神和力量。

1953年，华文学院前身——广州华侨学生补习学校成立，各地华侨华人回到祖国（祖籍国）学习、生活，他们和老师们一起，开始了一段艰苦的创业史。此后40年，学院历经时代的风云变幻，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广大师生员工和校友对学院的挚爱始终不渝。1993年，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成立，成为一所面向海外和港澳台地区开展华文教育、对外汉语教学及预科教育的专门学院，给学院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今，学院已经发展成为一所语言教学与研究并重的专门学院，可以为海内外学子提供包括华文教育在内的从华语学习到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的系列课程，而新成立的全国首家华文教育研究院则将为世界华文教育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值学院成立60年之际，校友、教工、学生纷纷敞开心扉，一述创业之艰辛、成功之幸福、校庆之愉悦，其中既有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有温情满溢的瞬间，一甲子的心路轨迹尽现眼下的这本文集。读者可以从中尽览桃李芬芳、体味酸甜苦辣。新一代华文人，将沿着前辈的道路，获取勇气和力量，下一个60年的辉煌也将就此扬帆起航。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院长



2013年11月16日



目 录

第一章 开拓篇

（五、六十年代始创阶段部分校友回忆录）

创校历程

空前绝后的归国潮和华侨补校——国庆六十周年感怀	符国柱.....1
回望历史，再奔前程	徐元昭.....6
广州补校校舍基建变迁简忆	符国柱.....12
北上南下“补校”初期亲历记——怀旧纪要	符国柱.....14
忆广州华侨补校早期接待分送工作	萧 强.....20
军民鱼水情	张伯良 周经志 梁德标 黄耀民.....24
三十三年话“孤儿”	梁德标.....31
校园趣事三则	张树人.....33
难忘的岁月 难忘的情怀	蔡启蟾.....36
下乡学农去——首批补校侨生下乡劳动锻炼追忆	张 焯.....38
“补校”是海外学子成长的摇篮	黎爱英.....40
我是补校的留校生	邹少文.....44
补校对在校劳动观念的培养	邱维岳.....46
补校往事拾忆	詹道泉.....47
难忘昔日我在广州华侨补校学习和工作的岁月	杨豪勇.....50
归国五十年杂谈	张自勇.....52

心路历程

侨生的贴心人——忆我的班主任王琼老师	潘正红.....54
怀念赖增创校长	萧 强.....56

记陈成敬老师二、三事	陈（肖）锦东.....59
难忘的岁月	郑兴志.....61
回国成长之路	张 焯.....63
回国前后	陈继武.....65
海外孤儿有了娘	翁 惠.....67
回国后的苦辣酸甜	陈质彬.....71
难忘补校	魏建安.....84
我在补校上的第一堂语文课	邱维岳.....87
没有放弃的“美梦”	李莉嫵.....88
感恩母校——广州和汕头华侨补校	何吉妹.....93
走过的路	丘荣玲.....96
五十五年家国情	梁德标.....98
我的人生足迹	黄仁生.....106
从“海外孤儿有了娘”到“我们这一代”	梁德标.....111
缅怀过去,珍惜现在,创造未来	梁德标.....113
历史的回眸	钟玉康.....115

第二章 创新篇

（改革开放以来谱写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新篇章）

建设发展

载誉十年 月满今秋	温明亮 王 慧.....117
预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李志红.....123
铿锵步履六十载，再创辉煌正当时	王咏雪 颜婷婷 郑维宇.....126
华文学院校区规划和建设发展情况	张耀明.....128
1993 年以来我院各层次学生人数和生源统计	蔡虎昌.....132
继往开来任重道远的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研究生教育	萧桂珍.....138

华文那些事儿

关于教工排球赛的那些事儿

赖章荣.....144

红楼剪影

伍丽梅.....147

我和华文的十二年

王 晶.....149

心灵成长

从山口洋到瘦狗岭

李计伟.....153

我与学院共成长——记录在华文学院的青春岁月

方李瑾.....156

大学的一些事儿

曹钦明.....159

成长的路，我们同行

戴玉洁.....161

无与伦比的华文

赵小莉.....164

第三章 校园篇

(60 华诞，五洲学子齐欢畅)

校园生活

让梦飞翔

陈 丹.....165

华苑时光机

钱强文.....169

情牵华文

何智敏.....172

小小的幸福

丘穗仙.....175

我与华文结个缘

覃世君.....177

留学在中国与 60 周年庆典相遇

李梅敏.....180

在留学华文的日子里

王燕萍.....182

华文与我的故事	张小青.....185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张韵茹 刘嘉欣 苏宝华 谢远太.....190

心怀感恩

赤焰年华——献给华文 60 岁华诞	贺娟萍.....195
华文，我爱你	刘 莉.....197
你是我律动的青春——致母校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60 周年华诞	董冬郁.....199
我与你一起成长——献给华文六十岁生日	王英蕊.....201
木棉花开六十年，暨南华文绽异彩	李 舒.....203
祝我的良师益友——华文学院六十生日快乐	骆 桃.....205
华文有 你，我，他	刘晓燕.....207
要离开了	王青园.....210
华文伴我行	甘志斌.....214
青春正好	高莹莹.....216
其实你不懂	汪蓓蓓.....218

附录

第四章 人生篇 (校友人生之旅)

一个侨生的成长	高光宝.....219
我的故事	黄顺远.....222
我的中国心	何 胜.....224
终生无悔	钟玉昌.....231
坚定信念，必有路可走	游国屏.....232
忆“汕头华侨”的教育工作	萧 强.....235
歌声中的回忆——记“上山下乡运动”	李锦城.....242
曲折唐山路 真诚赤子情	黄仁生.....244
当年青春献祖国 现今晚年献余热	张 焯.....248

第一章 开拓篇

（五、六十年代始创阶段部分校友回忆录）

创校历程

空前绝后的归国潮和华侨补校

——国庆六十周年感怀

符 国 柱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走过了六十个春秋，在这辉煌的历史进程中，海外的游子孤儿也终于“从此有了娘”——祖国的新生强盛给他们带来了无限希望，祖国的宏大胸怀给了他们无比温暖的精神家园。

回顾历史，值得一书的是新中国成立伊始涌现的海外华侨子弟“回国升学热潮”，估计不下十万之众。海外归侨学子的共同心愿就是“学好本领，建设新中国”，这股回国潮虽然持续了不到二十年，但在共和国华侨史上，其规模和意义都可谓空前绝后。

华侨补校是为迎接这一热潮而专门成立的第一所学校——最初的全称为“北京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以下简称“补校”），成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两周年前夕，由辛亥革命老人、中侨委主任何香凝题写校名，九月一日正式开学。初始学生仅一百余人，随后，由于回国侨生逐年增多，北京补校无法接纳，所以，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下简称中侨委）和教育部联名发函成立的“全国华侨学生招生委员会”，从1953年开始，又先后成立了广州、厦门、昆明、武汉、南宁、汕头等地的补校。全国招生委员会要求这些补校会同各地教育部门贯彻执行其所规定的方针，即“一视同仁，适当照顾”，从学习、生活等各方面妥善接待、安置归国升学侨生。所以，补校实际上是作为回国升学侨生进入正规中学、大学过渡性的摇篮和桥梁。补校既是采用同一校名、招收同一生源、实行

同一方针的特殊学校群体，又是由中侨委全额拨付经费、统一领导的侨务系统内独立核算的教育事业单位。补校的工作成为新中国早期侨务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移民海外的侨胞子弟如此大规模地回国升学，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可谓史无前例。而初生的新中国人民政府在百业待兴之时，为妥善安置这一史无前例的“侨生回国潮”，政府专门设立的补校系统，制定方针政策，付出如此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充分体现了新中国政府的人文关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补校实际存在时间前后不过三、四十年，这一历史瞬间虽成黄花，却是不可磨灭的史实。祖国政府为侨生回国升学而设立的数所补校，如同为遭排华迫害归国的难侨而兴办的几十个华侨农场一样，容纳了一批批“海外孤儿”，华侨补校和华侨农场成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外华侨与祖国关系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两项壮举，我们这一代历史见证者更是终生难忘。

按照历史唯物辩证观点，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原因和过程。补校是应时而生、因需而设，其成立发展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首先，最根本的条件是新中国的诞生，为受尽百年屈辱的中华民族带来了新的希望，三座大山推翻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海外孤儿也挺起了胸膛。举国上下同心同德，恢复千疮百孔的经济，收拾旧政权留下的烂摊，清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抗美援朝，顶住国际反华、反共压力，树立民族自信和维护民族尊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洗刷被外邦歧称为“一盘散沙”、“东亚病夫”的民族耻辱，代之以民族的独立、自尊、自强、自豪精神。神州大地从未出现过如此振奋民族精神的团结局面，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建设新中国成为举世华族的共同心愿，“振兴中华”成为千百年来时代最强音。这种大好形势也极大地激发了海外赤子的爱国本能，众多华族子弟因而更加向往祖国，蜂拥回国求学，形成了不可阻挡的归国热潮。

其次，这种情况也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日本侵略者进占南洋，当地华文教育受到摧残因此被迫中断，战后，有些国家由于政治原因排斥甚至禁办华文教育，大批华人子弟失学；二是战后南洋各国争取民族独立，摆脱殖民统治，社会经济尚不太稳定，不少华人子弟都为前途出路彷徨。正当此时，新中国给他们带来了曙光，家境一般的侨生，也就自然选择回国升学之路。而祖国母体的本土教育质量水平略高一筹，也是吸引海外学子的因素之一。

三是由于政府对侨务工作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包括回国侨生的教育、安置和对补校的办学要求等。从清末到民国以来的数十年间，虽然社会动荡战火连绵，但仍有少量的侨生回国读书，当时的政府和社会有识之士也办过一些面向侨生的学校，如暨南大学、华侨中学等。抗日战争时期不少侨生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层层封锁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追求真理，投身民族救亡解放运动。但其数量规模声势完全不可比拟于新中国成立后短短几年期间的“回国升学热潮”。面对海外学子这一回国热，中侨委考虑到海外与国内教育水平、生活习惯以及政治思想观念方面的差异，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方针政策，要求各地对回国侨生不得歧视；而对其差异性、特殊性，一要承认尊重，二要适当照顾，耐心对待，要以高度关爱之情，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生活学习环境、缩小差异，发扬他们的爱国精神，鼓励他们努力上进，培养他们成为建设祖国的有用之材。中侨委为了切实帮助侨生实现升学之梦，创办补校作为过渡桥梁。这显然是从侨情国情出发的英明决策。历史实践证明，补校在贯彻侨生教育方针政策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应有的积极贡献。众多侨生从经过补校这一“过渡性摇篮”初期哺育，到走进各种正规学校深造，走向社会，经风雨见世面逐步成长。他们从补校起步走上自己的人生道路，在以后的风雨岁月中，虽然各人际遇不同，但补校那一段短暂时光和与“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欢聚一堂的老师、校友所结下的情谊，都是他们终生难忘的一曲青春恋歌，永留心中。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文革”的冲击，1968年夏秋，北京、广州两大补校最后一批侨生分别“上山下乡”到北大荒和海南岛，全国补校也宣布停办。虽然“文革”中断而后复办的补校仅存北京、广州、厦门3校，但归国求学的侨生已不复文革前的盛况，侨生生源近乎“枯竭”。新生来源不继，补校失去其存在条件，终究成为历史。

随着社会进步，时代发展，改革开放，形势变化，绝后的“回国升学潮”变化成空前的“出国留学热”。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学习中国文化也逐渐成为世界一股新潮流。这种形势下，在补校原址、校舍成立的暨大华文学院和北京华文学院，取代补校原来面向侨生的部分职能任务，将华文教

育推向一个新的历史平台。进入经济全球化新世纪，华文教育走向国际化，似乎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后记：

1951年8月暑期，一位爬过雪山草地的红军老战士许坚明，带领一个招生组由京来穗，对我们几十位刚进祖国南大门、坚持要求北上的侨生进行个别面试之后，便将我们带到北京，送进刚刚创办、设于东堂子胡同25号的“北京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经过文凭甄别，读过高中的同学被安排到燕京大学先修班，初中以下的则简单测验后编入补校各班，我被编入高中一班“补习”。从此，我随校舍三次搬迁，接受了多位老师的教诲，同窗学友也变换了无数，三次留校“补习”到高二，当了两个半学期的学生会主席。1953年暑假参加接待大批到京的新侨生过后，便与十几位老同学一起（附注），在阜成门外的新校舍留校分配工作；而后，我们一行十几位老师同学，又随一位曾在华北平原打过日本鬼子的老战士傅克南下，投入广州华侨补校初期石牌校舍的创建工作。直至1958年元旦调离，到中国新闻社当记者。我前后在北京、广州两所补校学习工作生活了7个年头。这期间，是我人生道路上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根本性转折阶段。7年补校对我的教育、培养和锻炼我终生受用不尽，毕生铭记。在新中国60周年大庆之时，我们这一代侨生均已步入垂暮之年。环顾半个世纪祖国天翻地覆的发展变化，回首补校的历史轨迹，缅怀当年的师生同窗情谊，不胜感慨。即便补校早已先后解散，师生亦已天各一方，但同窗之谊，师生之情，连同解放之初、崭新的社会风气交汇融合，形成人与人之间互信互爱，一种共同的爱国情怀，至今还存在同时代人心中。

附注：

1953年秋，一同留校工作的高二同班同学有马来西亚侨生廖正方、高汉永、陈运才，印尼侨生林金地，他们学业优秀，分别担任物理、数学、化学教师；我则当了“万金油”干部；低一班级的同学有郑少先、肖强、刘振光、古方毅、郑球地、吴均任等，都是分别来自印尼、砂捞越、泰国的侨生，留校初期担任行政后勤或新生接待工作。

以后同窗各散东西，际遇各有不同，事业各有奉献，如今也大都在安度晚年。在还保持联系的好友中，算得上有突出成就的如楼大鹏，他 1953 年秋离开补校，进入北京四中，而后考上北京钢铁学院，当时在第一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上跑 110 米高栏，一举打破全国记录，而被留校当体育教员。在与美国进行乒乓外交活动中担任翻译员，以其流利的伦敦标准英语，活跃在国际体坛。而后任国家体委委员，并出任国际田联副主席。在 2001 年莫斯科申奥大会上作为申办方代表之一发言，成为中国乃至国际体育界知名人士。

另一位是由学转商的林金地。他从广州补校重返北京，继续升学考入唐山铁道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铁道部塌方研究所，六十年代赴港，从楼盘工地杂工起步创业，而后成为经营国货生意的爱国老板，颇有经济实力，如今在同学中位居“首富”。

在师长中最为大方，为补校时期同学熟悉的是傅克。他是华北抗日红小鬼出身，曾经临危奋身抢救电报密码本而受到军委的通电嘉奖。他调补校当办公室主任时尚不足三十。因其作风民主，工作踏实，平易近人，宽容大度，一视同仁地关爱培养侨生，被侨生视为亦师亦友。他在补校先后生活任职五年，后来调任四机部 798 厂领导时，力排群议，招收了三百多侨生进厂当技术或者业务骨干。他如今虽然已年近九旬，但仍与许多老侨生保持联系，互相关怀。

回望历史，再奔前程

徐元昭

1952年6月2日，我们——印尼华侨学生回国升学团一行940多人，从印尼各个港口汇聚到荷兰邮轮“芝渣连加”上，经过七天六夜的航程，到达香港，转入深圳，直达广州。

我们这批华侨学生回国升学，可以说是新中国与印尼建立邦交后直接回国升学的最大一批归侨学子，也可以说是首批。大家怀着对新生祖国的无比热爱之情，决心离开海外比较优裕的生活条件，毅然告别自己的父母亲人，投入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中来，积极求知进取，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决心在学成之后投身到祖国建设的热潮中去奉献自己的一腔热血。

我们一踏上“芝渣连加”号邮轮，各地各校回国升学的领队人员就聚合在一起商讨成立“印度尼西亚华侨学生回国升学团”，经过热烈讨论并选出由21人组成的理事会，然后又从这21位理事当中再选出五位执行理事，我由于在东爪哇几个学校教过五年书，年纪又比他们稍大一些，大家尊称我为“老师”而推选我当了执行理事之一，大家合力同心，尽责尽力，要把同学们安全地带到北京。

当我们一行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接待，从深圳乘坐火车直达广州后，由于是建国初期，省侨委还没有专门的接待机构，也没有专门的招待所，所以我们被临时安排在几间中学的课室里住宿，而行李则被集中放在离火车站较近的惠爱中学（即现在的农讲所）。第二天，省侨委就在北京路永汉电影院召开欢迎大会，热烈欢迎我们回国。就在大会进行时，省侨委的一位副主任突然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永汉电影院斜对面）个别谈话。他开门见山直接说明要我留在广州直接参加工作，这使我感到非常突然，思绪万千地问他说：“你们怎么知道我？为什么要单独留我在广州直接参加工作？”他说：“我们新中国已同印尼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有驻印尼的大使馆，也有总领事馆，你在印尼东爪哇当过教师，还当过教务主任，有一定的教学经验，你本身又是华侨，懂得侨情，了解华侨学生，我们准备在广州创办一所华侨学校，很需要像你这样既年轻、懂侨情，又了解华

侨学生的人才来参加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认为你比较合适，才特别找你征求意见，希望你能接受，并且高高兴兴地留下来同我们一起去创办华侨学校。”我回答说：“王任叔（巴人）大使，何英总领事并不认识我呀？怎么我一到广州，你们就要我留下来呢？在回国升学团里，我还是执行理事之一，我有责任把大家安全地带到北京去，如果我留在广州，那我就辜负了同学们，就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这是万万不可以的！”那位副主任听到这里，就没有再坚持，放我上北京了。

可是，到了北京，中央侨委把我们分别安排在东四王大人胡同（即中侨委办公地点）附近租用的几处民房如大方家、前肖家、演乐胡同以及东堂子胡同附近，然后又分别把同学们编排成准备高考班，准备升高中班和一些插班生班，聘请老师来为同学们进行复习，我参加了两天高考复习班就被叫停了。中侨委派了两位干部，一姓吴、一姓肖的同志，天天找我谈话，内容同在广州那位副主任说的一样，他们反复动员我暂时放弃升大学直接留下来参加工作，还在反复谈话过程中特别强调：“廖公交代，只要你留下来参加创办北京华侨学校的工作，过一段时间，一定保送你上大学，然后你再回来担任教学工作，这样不是很好吗？”我无可奈何，只好去找我四年前先期回国并已在北京工作的老同学（这位同学参加过建国大典）征求意见，他鼓励我说：“既然已经回到国内了，你就听从政府的安排吧！至于升学，以后再想办法，如果廖主任讲的是真的，那你就可以答应下来。”就这样我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才答应下来，很快我就被临时安排到侨生住宿的演乐胡同宿舍去当管理员，与在那里的学生们同吃同住，每天来回跑东堂子胡同向领导汇报情况，办事情。到八九月间我才被正式通知定为工作干部，工资级别是工资分 210 分。不久就把我调到许坚明主任（长征老干部）领导的建校办公室同杜俊添、张小兀等同志一起天天跑阜城门外华侨补校的建设工程地，检查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然后随时向领导汇报，直至向何香凝主任汇报。到 1953 年上半年，北京华侨补校新校舍在阜城门外落成了，就把在市内各驻地的华侨学生全部搬去新校区，很快我的工作也变动了，被安排在冯家祯同志领导的联络接待处工作，负责接待安置新侨生。

1953 年 12 月，为适应大批海外华侨学生和华侨青年回国就学的需要，祖国母亲进一步敞开了博大的胸怀，中侨委何老太（香凝）主任和廖公（承志）副主任又决定在广州和福建集美同时创办两间华侨补校，并由中侨委抽调两批人员分

别南下。我有幸被抽调到广州这一批，领导指定陈树彩同志为领队，我是副领队，我们一共有十八个人，当中有干部有教师也有后勤人员。12月18日我们乘坐火车经汉口转武昌再直下广州，而赴集美的那一批则由杨新容同志领队直奔集美。

到达广州后，我们很快就被分别安排参加基建工作，接待新侨生和准备开课的各项事宜，其中最为幸运的是高汉永和廖正方，他们两人很快就被保送到华南师院插班进入数学系和物理系学习，而我则被安排参加基建工作。

创办广州华侨补校，中侨委明确是由中侨委主办，当时的华南分局和省侨委协办，先在石牌征用建校用地（即现在的暨大校址）并由省政府将原南方大学部分校舍划拨给华侨补校作为建校用房（即现在的华师附中部分校址）而建校人员则分别由中侨委、省侨委从各地调集，到1954年3月，中侨委又从北京调来第二批人员22人，由傅克同志领队南下。这一批大多是教学骨干，包括准备担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各科教学的老师和一部分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团员。他们一到广州就着手准备开学事宜。为了充实学校的师资队伍，华南分局和省政府还从华南师院应届毕业生中挑选一批优秀毕业生到补校任教，同时还从各有关学校抽调一批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学骨干充实师资队伍，使学校顺利地于1954年中正式开课，校长就由当时华南分局统战部长饶彰风同志兼任，归侨教育前辈祝菊芬同志任副校长，傅克同志任办公室主任。

在新校建设方面，从1954年初开始就紧锣密鼓地大兴土木，很快推倒了几座山岗，填平了鱼塘菜地，以惊人的速度建起了教学楼、大礼堂、科学楼、办公楼、饭堂和学生宿舍、教工宿舍等一大批新校舍。短短一年时间就使学校扩大了好几倍，而这时海外的学生也大批涌来，到1955年春夏就完全搬到新校舍上课，不久胡一声同志被任命担任华侨补校校长，同时还调来黄志猷、何志一、许昭明、吴刚等同志担任副校长，何希銓、赖增创、王玉尧等同志任教导主任。他们全都是华侨教育界的前辈，都具有非常丰富的华侨教育工作经验。

就在新校矗立在广州的石牌之后，大批海外学子蜂拥而来，尤其是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学生为最多。还有少部份来自斐济、日本和印度。加上省政府当时又决定把原港澳补校也合并到华侨补校来，所以到1956年在校的学生达到五、六千人，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广州华侨补校拥有学生最多的一个时期。在中侨委和各省、市、区侨务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把这一大批华侨学生分别安排到华东、华北和华

南几个省、市继续就读和升大学。

也就在这个时期，为了适应海外不断蜂拥而来的华侨学生求学的需要，中侨委又决定在汕头、南宁、昆明和武汉先后举办多所华侨补校，其办校人员也分别从北京、广州和集美三间老校抽调部分教职员工去支援。如广州华侨补校就先后抽调三批教职员工去支援汕头、南宁和昆明建校，其中何志一调去汕头主持校务，许昭明调去南宁主持校务。到1958年，中侨委和教育部又决定复办暨南大学和新办华侨大学，而暨大解放前是在上海办的，华侨大学则是新办的，这两所大学的复办和新办，都是侨字号的，都需要抽调人员去支援，其中何希銓主任就被抽调去支援华侨大学创校。而广州华侨补校也把大部分校舍划拨给暨南大学，自己来到原华侨招待所（即现在的暨大经济学院）继续办学。这时的校长也换了陈子广同志来担任，而胡一声校长则调到暨大去工作。

进入六十年代，由于国际反华排华浪潮的复起，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也刮起了排华的浪潮，许多海外华侨学生和华侨也纷纷要求祖国母亲能够敞开更大的胸怀，接待安置他们回国升学和生活，这样中侨委决定成立接待安置归国华侨和华侨学生的机构，其中的侨生接待站就设在广州华侨补校。这样广州华侨补校除了正常的办学任务外，又增添了接待安置蜂拥而来的华侨学生这个特殊又十分繁重的任务，我们的老师们既要承担繁重的教育教学任务，还要抽调大批人力去承担接待安置华侨学生的任务，而教职员工队伍的力量是有限的，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上级和学校决定从自己的学生当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保送他们到有关大学去培养而后再返回补校工作，这一批新生力量，在补校最为繁忙的时期脱颖而出，给学校的繁重工作注入了强劲的力量。使教育教学和接待安置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和落实。到1965年，由于暨南大学发展的需要，中侨委和省侨委又决定把华侨补校搬迁到沙河瘦狗岭原地质学校继续办学，学校的校长也由倪宏毅同志接替陈子广同志，紧接着，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汹涌而来，在极左路线下，广州华侨补校也遭到极大的冲击，被迫于1969年底宣告停办。

回顾我从1952年回国参加北京华侨补校的创校建设到调来广州华侨补校参加建校工作，以及在两所华侨补校工作的十八个春秋，我先后参加过建校工作，指导和管理归侨学生的生活，担任过学校青年团的专职副书记，承担过接待安置华侨学生的繁重工作，上完大学后又回到补校担任高中政治课教师和班主任，还